

從「參與式」到「命令式」： 廣西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初探

• 王力堅

摘要：1959年初至1960年初，廣西百色地區先後兩次發起反瞞產運動，其實質是國家與農民爭奪糧食。因此，中共政府與百色「革命老區」群眾的關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驗。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至今尚未得到學界關注。本文借助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參與式動員」、「命令式動員」的概念，對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進行探討，指出第一次反瞞產運動主要透過「參與式動員」，即說服、爭取、拉攏、欺騙等綜合手段進行；第二次則更多依靠「命令式動員」，重點表現為批判、鬥爭、打擊、強制。當局對運動的糾錯是局部的，沒有及時性及持續性，並且有反覆現象，因此成效有限。兩次反瞞產運動導致大饑荒的發生並加劇其蔓延。

關鍵詞：廣西百色地區 反瞞產運動 參與式動員 命令式動員 大饑荒

一 前言

1950年代初開始，統購統銷與農業集體化運動相繼啟動，使中國農村與農民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統購統銷，致使農產品資源國家化；而集體化，則促成土地生產資源國家化。統購統銷的提出與實施，是與集體化運動交織在一起的，而1958年的大躍進，將二者的負面作用發揮到極致——以大躍進全面追求高指標的「浮誇風」為前提，發展出一個十分合乎該時期的邏輯推斷：農產品既然高產，按比例徵購的農產品數量就必然提高，農民的糧食也自然受到極大的剝奪。當農民飽受「浮誇風」、高徵購的摧殘，惟能以瞞產私分的方式進行自救。換言之，瞞產私分很大程度就是為了因應、對抗「浮誇風」導致的超額徵購而產生。所謂「瞞產」，多為上級領導基於高估產，

認為基層(大隊、生產隊)所報實際產量為瞞產後的數量，即認為估產與實產之間的差額被隱瞞了；而所謂「私分」，實質上大多是本應合情合理地分配給農民的勞動所得(往往是微薄所得)，被政府視為瞞產後私自分配。對此，政府的應對措施便是動用國家政權力量，發動聲勢浩大的反瞞產私分運動(以下簡稱「反瞞產運動」)，實質上就是與民爭糧，爭奪農產品資源的控制權。本文以廣西百色地區^①為例，探討大躍進—大饑荒背景下發生於1959年初至1960年初兩次反瞞產運動的具體表現，以及其給當地農村、農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百色地區位於廣西西部山區，為壯、漢、瑤、苗、彝等族聚居地，歷來經濟落後，人民貧困。在本文考察的大躍進—大饑荒期間(1958-1962)，百色行政區劃管轄十三縣：隆林各族自治縣、凌樂縣、田林縣、百色縣、田陽縣、田東縣、睦邊(那坡)縣^②、靖西縣、德保縣、平果縣、鳳山縣、東蘭縣、巴馬瑤族自治縣。現今百色市區劃所隸屬的縣市雖有所變化^③，但不會對本文關於當時歷史的探討有太大影響。

海內外學界研究反瞞產運動的論文並不多見，而且多依附於其他議題中進行側面探討。如宋永毅的專文曾從「糧食戰爭」的角度來分析大躍進—大饑荒的起源，認為1950年代初期的朝鮮戰爭、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形成的糧食政策對大饑荒爆發產生重要影響^④。宋文雖然沒有正面論述反瞞產，但其所謂「糧食戰爭」，即隱含農民瞞產與政府反瞞產之間的較量。此外，也有學者從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政治參與的政治心理、「糧食烹調增量法」的實施等不同的歷史敘述，聯繫到反瞞產運動^⑤。

迄今為止，廣西(單獨使用時指廣西全境，以區別於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在學界尚未有專題研究的著述，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研究更是空白。基於此，本文試圖借助美國政治學家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在討論社會動員模式時所提出的「參與式動員」(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與「命令式動員」(command mobilization)概念，對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進行探討。白思鼎認為，在蘇聯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蘇聯共產黨運用的是「命令式動員」，亦即依靠城市工作隊在農村實施強制性措施，凡是抗拒農業集體化的農民，都會受到強力的壓制以至專政手段的鎮壓；在中國的集體化運動中，雖然也向農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組，但中國共產黨運用的是「參與式動員」，工作組的主要任務不是向農民實施強制性措施，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說服工作，包括通過訪貧問苦等方式進行社會動員，促成農民階級意識的形成與政治覺悟的提高，並通過製造群體壓力、適當的強制等綜合手段來實現農業集體化^⑥。從整體上說，對中蘇兩黨的社會動員方式作此大致的比較劃分，是可以成立的，但在現實中，二者並非是各自獨有的動員方式。另外，本文討論的內容雖然與白思鼎不盡相同，但中共領導下的農村群眾運動具有相類似的性質，因而，對上述兩個概念的借用應當具有適用性與可行性。

在歷史資料的運用上，本文主要利用當時的報刊，如《右江日報》、《廣西日報》等，輔之以文化大革命時期發行的傳單與小報及其後出版的當地志書(附當時的內部調查報告等)，多種資料交叉參照、互補、比較，並且適當利

用統計表進行輔助說明，力求做到盡量公允、翔實、豐富、完整地呈現並解讀歷史。

二 百色地區的兩次反瞞產運動

儘管1958年中國各地都已有反瞞產的操作^⑦，但全國性的反瞞產運動一般仍認為是開始於1959年2月下旬。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批轉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表示：「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⑧，由此掀起全國性的反瞞產運動。歷史學者即認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⑨社會學者亦認為：「中央尤其是毛澤東根據廣東省委書記的報告，錯誤地相信農民普遍瞞產藏糧，從而在全國掀起一場『反瞞產』運動。」^⑩

跟其他省區相比，廣西的反瞞產運動似乎開展得更早。1958年6至7月，在大躍進熱潮中，貴縣、賀縣、柳江縣等相繼開展了地方性的反瞞產運動^⑪。11月7日，中共廣西自治區委員會主辦的《廣西日報》第一版刊載自治區黨委農村部通訊組的報導〈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宣明開展全自治區以「核產」（核實產量）為標榜的反瞞產運動；同日同版發表的社論宣稱，核產是「從積極的角度防止瞞產」，號召「廣泛深入地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低報、瞞產的事實」，檢討「『打埋伏』〔清查農民有否秘密收藏糧食〕的錯誤」，鼓吹「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來進一步克服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思想，以消除瞞產的思想基礎」，「在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中插紅旗，拔白旗，通過核實產量的思想鬥爭，對每一個農民進行一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教育」^⑫。於是，「群眾性的報豐收反瞞產運動」^⑬在廣西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廣西的反瞞產運動有前後兩次，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也同樣有兩次，不過開始與結束的時間有所出入。廣西第一次反瞞產運動開始的時間當為1958年11月初，而結束的時間約在1959年3月下旬。與廣西其他地區相比，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的啟動晚了不少。1959年1月10日晚，中共百色地委召開各縣委負責人參加的電話會議，地委書記韓開祥主持會議並作指示，布置反瞞產運動工作，認為「有的地區還有瞞產私分現象」，必須「結合整社，抓好糧食工作」，「要依靠骨幹，依靠黨團員，依靠基本群眾，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開展大辯論」，「對群眾說明瞞產私分的害處」^⑭。15日至20日，地委召開二十三個「整社」（整頓人民公社）試點工作會議^⑮，之後各縣才紛紛召開各級幹部會議，全面開展群眾性的反瞞產運動，可見百色地方政府是以「整社」的名義與方式來推動反瞞產運動的。

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8月，全國各地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對人民公社進行了糾正「左傾」性質現象的初步整頓。然而，與民爭糧、極具「左傾」與「共產風」性質的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卻是在「整社」的名義下進行的。

這一做法，當是執行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在1959年1月14日至16日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指示：「對外，不要唱反甚麼的口號，就叫整社。」按照劉建勛的解釋：「把『反』一唱開，簡單化就易產生；本身是一個劇烈的思想鬥爭，但不必叫做『反』。」^⑩所謂「簡單化」、「劇烈的思想鬥爭」，顯然就是對與民爭糧的「左傾」、「共產風」性質的另類解讀。

據百色地委主辦的《右江日報》報導，1959年1月下旬，百色各地的反瞞產運動已經頗有成效^⑪。儘管如此，地委第一書記尚持於1月29日晚召開各縣委參加的電話會議上，仍認為「全專區還沒有形成群眾性的報出糧食是光榮的熱潮」，要求開展「六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表揚、大宣傳，即加大力度進行反瞞產^⑫。於是，反瞞產運動升級，報糧、交糧活動亦持續進行^⑬。到2月20日，百色地委召開電話會議透露：「全專區已報出糧食一億二千多萬斤，交出糧食五千多萬斤。」^⑭而此時，「有些幹部就產生了右傾、鬆勁情緒，認為社員報糧『已經徹底了』」。當地政府遂通過開展「五查」將運動導向更為全面且深入的階段：「查自己和別人的埋伏糧食是否已全部報、〔查〕是否已無糧可報；查集體埋伏的糧食是否已報徹底；查沒有到會的各階層是否還有埋伏糧；查幹部家庭埋伏糧是否報完了。」^⑮當局採取這樣一項措施，一方面表明運動施行者的徹查決心，另一方面也表明農民確實「無糧可報」，反瞞產運動似乎陷入了膠着狀態。

此時，政治形勢出現微妙的變化。在百色地委電話會議兩日後，即2月22日，毛澤東批轉前文提到的趙紫陽關於反瞞產的報告，認為情況嚴重，必須立即解決^⑯。在現有公開的有關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的各種資料中，均無發現毛澤東這個批示如何傳達到下面，但百色地委卻有頗為明顯的反應動作：25日晚，在百色地委召開的各縣委負責人參加的電話會議上，地委書記處書記楊烈對當前百色地區如何掀起更大規模的「報糧交糧」的群眾運動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更明確地認識糧食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深入進行反瞞產，「不獲全勝決不收兵」^⑰。據《右江日報》與文革後出版的各縣市志書記錄，自3月1日至17日，各縣相繼召開四級（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會議，展開更為徹底的反瞞產運動，如德保縣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後，迅速開展報糧評比競賽運動，掀起了報糧高潮，到9日止共報出糧食一億多斤^⑱。如此，也就將百色地區的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持續推向高潮。

然而，往後政治形勢出現更微妙的變化：在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再表示全力支持農民瞞產私分，高調宣稱「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認為「不應該批評他瞞產是本位主義，東西本來是他的，你不給他分，他只好瞞產私分」；「農民瞞產情有可原，他們的勞動產品應該歸他們所有」；「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是一種和平的反抗」^⑲。同樣，在現有百色地區公開的各種資料中，均無發現毛澤東這些講話如何傳達到下面。值得注意的是，《田東縣志》記錄了一條耐人尋味的會議信息：3月1日至17日，田東縣「召開以反『瞞產私分』為主要內容的四級幹部會議」，「3月10日，地委書記楊烈在縣四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⑳。這是百色地區所有縣市

(包括後來劃歸河池地區的鳳山、東蘭、巴馬三縣)志書中唯一一則關於傳達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記錄(當時報刊亦無此類記錄),其中也並未透露是否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支持農民瞞產的談話。然而,田東縣四級幹部會議結束次日,即3月18日,《右江日報》頭版卻全是春耕生產競賽之類的報導;這個以反瞞產私分為主要內容、由地委書記做重要報告的會議竟然不見任何報導^②。之後,反瞞產的消息在《右江日報》亦一度不見蹤影。也就是說,百色地區的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在高潮之際卻戛然而止。

直到半年後,即廬山會議之後國家開展反右傾運動^③,反瞞產運動才又捲土重來。廣西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發動的^④:

當年(1959年)8月至9月,自治區黨委舉行第一屆九次會議和自治區、地、縣三級幹部會議,批判「右傾思想」,把在大躍進中虛報產量、高徵購、放開肚皮吃飯所引起的缺糧情況,說是下面「瞞產私分」造成的,群眾手中還有糧食。於是,在全自治區開展「反右傾運動」和「反瞞產私分鬥爭」。

如前所述,百色地區的第二次反瞞產運動,也是稍晚了一步啟動。從有關資料可知,除了田林縣較早於1959年9月底啟動運動外^⑤,百色整個地區的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當在同年10月中旬結合「葉卜合思想轉變討論」全面開展。葉卜合為巴馬縣的一個生產隊長,曾經率領社員瞞產私分,經過思想教育後,轉變為反瞞產的標竿人物。10月19日,百色地委作出決定,要求各地通過關於葉卜合思想的討論,在基層幹部與社員中進行一次系統深入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提高基層幹部與社員的思想覺悟,達到打破資本主義思想行為,保衛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目的。百色地委的決議沒有正面提到反瞞產,但葉卜合是由瞞產私分轉變為反瞞產私分的典型,「葉卜合思想對於一些存有瞞產私分思想行為的幹部和社員,是一面明亮的鏡子」,因此關於葉卜合思想的討論,實質上就是反瞞產鬥爭的揭槩^⑥。

由上可知,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使「左傾」勢力得到極大的鼓舞,有力推動反瞞產運動以更為激進的方式發展。據文革時期的小報揭露:反右傾運動發動後,廣西發起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反瞞產運動。自治區領導人到臨桂縣五通公社蹲點搞「樣板」,並總結出「誘、擠、壓」三字經,提出「拳頭出白米,棍子出糧食」的政策,強行在廣西全盤推行,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大新慘案」、「環江事件」、「寧明慘案」、「(邕寧)那樓事件」、「(興安)高尚慘案」^⑦。

上述幾大慘案(事件)均發生在廣西其他地區,當時的報刊均無報導,而百色地區亦曾發生過一樁駭人聽聞的反瞞產事件——「德隆核產事件」。該事件在當時的報刊與文革時期的小報中也都沒有提到,文革後出版的《那坡縣志》卻有載錄:1959年12月,反右傾運動達到高潮之際,那坡縣委第一書記率縣直機關135名幹部到德隆公社進行核產,認為該公社核產不徹底,於是在1960年1月3日至26日,由縣委書記處兩位書記掛帥再次進行核產。大小隊幹部反映無糧或者有糧不多,各隊報糧極少。縣委領導則認定大小隊幹部瞞產私分,因而展開以核產為標榜的反瞞產運動,開會批判工作組和大小隊幹部

思想「右傾」，並進行重點鬥爭。「德隆核產事件」或許受到自治區領導人推行的五通公社「樣板」經驗的啟發與影響，在鬥爭中也發生了非法鬥打現象，被打230人，打傷118人，逃跑11人，鬥死8人，自殺8人；有四戶農家大人被打死，遺下孤兒5人^③。

至於廣西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結束，據文革時期的傳單記述：1960年1月30日，自治區黨委召開了電話會議，由農業書記李友九講話，號召把工作中心轉到生產上去，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於是「不了了之」^④。其實，在此之後運動依然持續進行。自2月起一直到年底，從有關縣市志書可見，蒼梧、寧明、昭平、鹿寨、河池、象州、玉林、陸川、容縣、永福等縣市仍通過四級幹部會議，或結合「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整風整社運動，進行反瞞產，還相繼發生了「大新慘案」、「環江事件」等惡性事件^⑤。

反觀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到1959年12月，《右江日報》只有寥寥數篇有關報導，1960年1月已幾乎找不到反瞞產的消息；《廣西日報》自1959年12月起也再無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的消息；1960年1月發生的那坡縣「德隆核產事件」在任何報刊均無披露。儘管《靖西縣志》仍有4月靖西縣四級幹部會議「結合反瞞產」操作的記錄^⑥，但當時報刊卻無此報導。百色地區全面性的第二次反瞞產運動似乎是響應了前述自治區黨委的電話會議，到1960年1月底便結束了，或許是血腥的「德隆核產事件」使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走到了物極必反的地步。

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尤其是第二次反瞞產運動，跟全國各地一樣，進一步加劇了大饑荒的惡化與蔓延。正如丁抒所指出^⑦：

全國範圍的死人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間，七、八月裏召開的廬山會議是阻遏災難發生的最後機會。「反右傾鬥爭」使毛澤東鞏固了他的統治，也葬送了那最後的機會，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饉就無聲無息地席捲了全中國。

或許就是由於政治與災荒的雙重壓力，觸發了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退場。此時期的《右江日報》呈現出一個頗有意味的輿論轉向：大力宣傳「小球藻」與「雙蒸飯」，似有「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意圖^⑧：先是在1960年1月22日轉發北京新華社稿〈為高速發展養豬業提供飼料，溫州專區大量繁殖小球藻〉、〈怎樣繁殖小球藻〉，之後又號召「掀起群眾性的大搞小球藻運動」^⑨；2月28日至3月21日，《右江日報》發表了十三篇有關「小球藻」與「雙蒸飯」的報導、社論、通訊。同時期除了南寧地區的《紅旗日報》發表過二則「普遍推廣先進煮飯法」的報導外，廣西其他各種報紙均無此類表現^⑩。百色地區開發小球藻並非為「養豬業提供飼料」，而是旨在其食用價值。如凌雲縣自1959年就陷入饑荒，浮腫、乾瘦病流行，1960年3月27日至4月2日，即「召開縣科學工作會議和小球藻訓練班，準備開發小球藻食品」^⑪。《右江日報》的做法可以說是起到以此運動結束彼運動的作用，既轉移了反瞞產運動的方向，也為運動造成的饑荒缺糧作出必要的救災替代措施。

三 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比較

如前所述，百色地區先後兩次反瞞產運動表現的特點，可以分別借助白思鼎的「參與式動員」與「命令式動員」兩個概念進行概括與論述。所謂「參與式動員」，按照白思鼎的說法，在集體化運動中，組織者不是向農民實施強制性措施，而是向農民進行宣傳和說服工作，並通過製造群體壓力、適當的強制（如說服、爭取、拉攏、欺騙）等綜合手段來實現農業集體化。如此看來，在廣西百色地區的反瞞產運動中，主動權也可以說是在群眾手裏，群眾被說服教育後，以主動甚至是積極的態度參與到運動中去。

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的報刊報導，似乎體現出透過「參與式動員」而造成群眾「主動積極」的表現。但實際上，群眾這種「主動積極」的表現，恐非心甘情願，而很有可能是當局「代民作主」的結果。《右江日報》有此報導：巴馬縣鳳凰人民公社三聯大隊全部是瑤族社員，過去對公社有「誤解」，因而瞞產私分很多，通過宣傳和學習，「他們消除了誤解，積極投入整社工作」，共放出八百張大字報。然而該報導的另一個重點則是：該公社組成宣傳隊到各屯去大力宣傳，同時還把小學教師、小學生、農村知識青年組成「代寫組」，登門上戶宣傳政策和「代寫大字報」，共放了1,520多張大字報^②。兩相比較，當可了解報刊所報導的農民在運動中「主動積極」的行為與態度，其實有相當部分是經過他人的代勞。

當局似乎是為了讓群眾交糧的主動性與積極性變得更為合理，這時期《右江日報》出現了一個別具意味的稱謂：「代管（藏）糧」。報刊報導的標題屢見該稱謂，如〈苗族社員熊卜周，愉快交出代管糧〉、〈安排好社員生活，反覆交代政策，平果城關公社報出二百多萬斤代管糧〉、〈重重顧慮永拋棄，一心依靠共產黨，瑤族社員鄧卜韋交出一萬六千多斤代管糧〉、〈多敬中學報出代藏糧一百多萬斤〉^③。此稱謂僅在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出現於《右江日報》（15篇報導、22次），同時期《廣西日報》及其他地區的報刊均無出現。表面看來，此稱謂意即瞞產私分的糧食是集體（國家）的糧食，農民只是「代為管藏」而已，交還給公社（國家）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這個概念似乎是出自廣西自治區反瞞產運動的領導人：前文提到1959年1月中舉行的自治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柳州官員匯報宜山縣在山洞裏發現4,570斤糧食沒人承認，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劉建勛說：「沒人承認算公家的！」書記處書記韋國清插話說：「本來是公家的！」^④兩位書記的意思很明白——農民隱藏的糧食本來就是國家的。那麼言外之意當是：藏糧人只是代國家管理糧食而已。半個月後，即2月3日，「代管糧」的稱謂便首次出現在《右江日報》^⑤，二者之間的關係不免發人聯想。無論如何，該稱謂似乎試圖達到掩飾政府通過反瞞產運動掠奪農民糧食、將糧食佔為己有（國有）的實質意圖，這恰好揭示出反瞞產運動就是與農民爭奪糧食，是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對抗運動。

群眾更為「主動積極」的表現，當為通過憶苦思甜，積極「向黨交心」而獻出「埋伏糧」。據《右江日報》2月以來的報導：百色地委召開糧食工作電話會

議，地委書記號召公社幹部、社員趕快向黨交心報出「埋伏糧」^{④⑥}。巴馬縣四級幹部會開展階級教育，「通過回憶對比算賬，人人向黨交心」。如紅旗公社坡町大隊生產隊長黃顯龍通過新舊社會對比，尤其是「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的感召，自覺地報出了「打埋伏糧」800斤^{④⑦}。德保縣四級幹部代表向黨靠攏，向黨交心，爭先報糧。通過兩次報糧高潮，共報出糧食7,149,706斤^{④⑧}。隆林縣委在五万多人的「報糧大會」上，提出「交心再交心，報糧再報糧」的口號，一天內就報出糧食7,489萬斤^{④⑨}；隆林縣各族幹部堅決聽黨的話向黨交心，一個小時報出「埋伏糧」170多萬斤^{④⑩}。凌樂縣四級幹部會議向黨交心，糧油並舉，掀起報糧高潮，四個小時內報出「埋伏糧」2,948萬多斤，油料8萬多斤^{④⑪}。有意思的是，「向黨交心」的提法僅頻頻出現在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期間的《右江日報》報導，同時期其他報刊中只有南寧地區的《紅旗日報》與梧州地區的《梧州躍進報》偶爾出現^{④⑫}。《右江日報》這種提法，或許是出自「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的自信與思路^{④⑬}，故有此告誡：「翻了身，不忘本，靠攏黨，向黨交心！」^{④⑭}但字裏行間卻也更顯見「黨」要籠絡、控制民心的意圖。

如前所述，反瞞產運動的實質是與農民爭奪糧食，因而在第一次反瞞產運動中，標榜着「人民」稱號的各地「人民政府」似乎難以「理直氣壯」地進行反瞞產運動。更為關鍵的，或許還有毛澤東的態度——毛澤東雖然批轉趙紫陽報告發出反瞞產指令，但數日後多次高調表態支持農民瞞產，同時卻又批評農民「瞞產私分，名譽很壞」^{④⑮}。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致使地方反瞞產運動的實際操作者陷於尷尬處境，只能採取外鬆（宣傳）內緊（運動）的方式進行反瞞產運動。

由上可見，百色地區第一次反瞞產運動不僅以「整社」的名義與方式發動，在運動過程中，「參與式動員」更得到頗為充分的表現——煞費苦心地運用了「代民作主」、「代管糧」、「向黨交心」等迂迴策略，令一場逼民奪糧之戰搬演為受蒙蔽的群眾幡然醒悟後，積極投身愛國運動、爭獻愛國糧的大戲。從上述三種迂迴策略施行的時間進程及其含義看，也頗為耐人尋味：前二者多施行於1959年2月下旬之前，後者則多施行於2月下旬之後。前二者的行為主體似乎多見為「群眾」，但後者中「黨」的形象顯然佔據了主體位置。事實上，所謂「參與式動員」，其操控權始終還是在運動主導者手中。

2月下旬這個時間點，也恰是導致百色地委領導的意圖出現變化，促使運動走向激烈發展的關鍵時刻：2月25日晚的糧食工作電話會議上，地委書記處書記楊烈「對當前我專區如何掀起更大規模的報糧交糧的群眾運動，作了重要指示」，首先強調「糧食徵購任務必須完成，絕不能動搖……讓農民手裏留有很多糧食，沒有甚麼好處」；在具體操作上，要求「大會套小會，聲勢浩大與深入思想發動相結合」，「繼續瞞糧不報，拒不坦白，一經群眾揭發檢舉出來，給予處分」，「在運動中還在進行瞞產私分等破壞活動的，應予以法辦」，「組織幾個報糧高潮，不搞徹底不散會」^{④⑯}。這樣一個強勢的轉變，當跟毛澤東在2月22日發出反瞞產指令有關。如此咄咄逼人的言辭、鋒芒畢露的操作，莫不對基層幹部和群眾形成強大的思想與精神壓力。

於是，運動早期力求避免的「簡單的工作方法和強迫命令」現象^⑦，此時卻是名正言順、堂而皇之地遍地開花了：光從〈靖西四級幹部會展開兩條道路的辯論，一直肯定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鐵的事實駁得「算賬派」啞口無言〉、〈肯定大豐收，駁倒算賬派，鳳山已報糧一億二千多萬斤〉、〈回憶對比算賬提高覺悟，德保四級幹部會狠狠批判各種錯誤思想〉這些報刊報導的標題便可見聲勢浩大、以勢壓人的場面與氛圍^⑧。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參與式動員」的騙局算是失敗了。

相比之下，第二次反瞞產運動卻是更多依靠「命令式動員」，即拋去「參與式動員」較為溫和的方式，更直接地表現為批判、鬥爭、打擊、強制（搜刮/掠奪）。一如白思鼎的說法：實施強制性的措施意味着，凡是抗拒合作的農民，都會受到強力的壓制以至專政手段的鎮壓。雖然所謂「命令式動員」是指蘇共採取的應對方式（與中共的「參與式動員」對比），但中共的群眾運動亦不乏這種「命令式動員」的表現，尤其是當運動發展出現某種困難或阻礙，又或者運動主導者的指導觀念產生變化的時候。

第一次反瞞產運動早期，百色地委第一書記尚持還特別指出，各地必須嚴加防止簡單的工作方法和強迫命令的現象發生。不過，這個約束在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後期已經鬆動，到第二次反瞞產運動，更公然出現如下情形^⑨：

百色縣 1959 年大搞糧食「反瞞產私分」運動，基於高估產而實行高徵購，糧食入庫尚未結束就出現了一些農民缺糧斷炊。當年全縣共「反出」瞞產私分糧 250.5 萬公斤，列入當年返銷糧食分配數中。也就是用子虛烏有的 250.5 萬公斤「瞞產糧」，分配給確實「缺糧斷炊」的農民，這種惡劣的「畫餅充飢」手段，造成「群眾意見很大」。

1959 年秋後，鳳山縣已經出現逃荒、餓死人現象，鳳山縣委仍派出工作組深入大隊、小隊、農戶追繳所謂「瞞產私分」的糧食，使「饑荒和餓死人現象愈演愈烈」^⑩。11 月，百色地委四級幹部會議之後，那坡縣積極開展反右傾運動，12 月，反右傾達到高潮，進而於 1960 年 1 月發生了血腥暴力、死傷達三百多人的「德隆核產事件」。其後，全地區的反瞞產運動基本結束，但 4 月靖西縣四級幹部會議卻仍「結合反瞞產」進行操作，歷時十六天的會議期間，產生了揭發貪污的大字報 235,461 張，意見 247,781 條；揭發浪費、官僚主義的大字報 224,300 張，意見 324,900 條^⑪，顯示出多種手法綜合運作而形成的浩大聲勢。這種鋪天蓋地的聲勢使運動的實際操作者與被運動者莫不感到膽戰心驚而不得不屈服於運動的強大壓力之下。

這樣一個動員方式上的轉變，其原因固然在於農村糧食供應持續惡化，農民及基層幹部的瞞產私分現象日益普遍，嚴重干擾甚至破壞了政府的糧食徵購任務，因而當局不得不再次通過更劇烈的反瞞產運動，強制性地超額徵購糧食以保障城市與重工業地區的需要^⑫。然而，更重要的原因，無疑是來自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

換言之，有了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尚方寶劍，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主導者更是有恃無恐，無需故作姿態動員群眾參與，而是直接進行命令式

的推動。具體而言，不再運用第一次反瞞產運動的「代民作主」、「代管糧」以及「向黨交心」之類的迂迴策略（報刊上不再出現此類詞語），而是擺出予取予奪、志在必得的姿態，正面開展一場「農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③。當時公開發表的報刊文章與會議用語雖少有直言「反瞞產」，還是更多以「社會主義教育」、「反右傾」等政治運動的名義出現，但鬥爭目標更鮮明，矛頭直指「富裕中農」。

百色地委在1959年11月19日的電話會議中一再強調批判「富裕農民」（即富裕中農）的思想，顯見富裕中農已然成為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主要鬥爭對象^④：

一破〔資本主義思想〕一立〔社會主義思想〕，這就是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這是兩條道路鬥爭的性質，但是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以富裕農民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思想，是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把妨礙大躍進的富裕農民思想批判掉。

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時就認為：「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着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⑤在地主、富農經過土地改革而失去實際活動能量之後，富裕中農似乎就成為跟合作化/集體化對抗的主力，因而成為革命鬥爭的主要對象。1959年12月12日，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區工作組在《右江日報》著文宣稱：「在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少部分富裕中農資本主義陰魂未散，迷夢未破，重返資本主義道路的野心未死。」^⑥毛澤東對農民這個群體（階層）始終是心存疑慮的，1940年代末中共建政前夕，便有「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認知^⑦；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亦指出：「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⑧於是，在第二次反瞞產運動中，雖然批判鋒芒指向富裕中農，但鋒芒所及，傷害到的卻是所有農民。

當時身處大饑荒重災區河南省商丘地區的顧準，將反瞞產運動表述為「國家 vs. 農民」、「國家與農民的衝突」^⑨。當然，這樣一種「國家與農民的衝突」，或許如白思鼎所分析的，並非是像斯大林主義那樣，將國家與農民的關係看作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衝突」（a zero-sum conflict—“it's them or us”），中共在大躍進一大饑荒期間的施政，仍是為了引導農民走向基於「毛澤東新觀念」（Mao's new ideological conceptions）所樹立的「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並且認為超額徵購糧食與農民的利益相一致。但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大饑荒只是中共當局施政錯誤的「意外結果」^⑩。

無論如何，順應廬山會議反右傾的政治風向，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的「命令式動員」更為無所拘束，與民爭糧的目的更為直接而明確，而運動操作的手段也愈來愈粗暴且殘酷，最終導致在反右傾達到高潮之後，發生了「德隆核產事件」，促使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難以為繼。於是，以1960年1月22日為肇啟的「小球藻運動」宣傳為掩護，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草草收場。

四 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的後果

反瞞產運動造成的惡劣後果，很快就不斷呈現出來，這種現象在當時的報刊不見蹤影，但通過官方當時的調查報告、文革時期的小報、文革後編撰的志書及官方公布的相關數據均可了解：

田東縣於1959年3月召開以反瞞產私分為主要內容的四級幹部會議，自4月16日起，全縣庫存商品糧僅能維持兩天，縣委不得不發出〈關於整頓市場糧食供應工作的緊急指示〉，大幅壓縮城鎮糧食供應；5月中旬到6月10日止，全縣先後患水腫病3,644人，痢疾646人，腹瀉671人^①。

德保縣在1959至1961年的經濟困難時期，糧食嚴重短缺，農村公共食堂只能以瓜菜代糧，全縣近萬人因營養不足而患浮腫、乾瘦、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等五種病(下稱「五病」)，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6,328人^②。

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委、鳳山縣監委聯合調查組在1961年5月17日提交的調查報告稱，在「糧食核產」(即反瞞產)期間，從1959年1月到1960年底，鳳山全縣共死亡6,095人，其中與糧食有關的共2,414人。喬音公社的那王等六個大隊全家死光的有六十九戶，共計273人，那王大隊第十二隊韋媽勤全家大小五口死於同一天^③。

1961年8月21日，自治區黨委提交的〈關於三級幹部會議向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的報告〉表明，1959年初以來，全自治區患浮腫、乾瘦等疾病的人達100萬，非正常死亡達30萬人^④。廣西文革中觀點對立的兩派都提到廣西反瞞產運動中非正常死亡30萬人。反韋國清派認為，30萬人是「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據公安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⑤。然而，根據1993年官方公布的數據，卻有大不一樣的陳述(表1)：

表1 1958至1962年廣西死亡人數和死亡率變動情況表

年份	死亡人數(人)	死亡率(‰)
1958	254,436	11.74
1959	383,952	17.49
1960	644,770	29.46
1961	422,201	19.50
1962	224,417	10.25

資料來源：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61。

說明：資料查核工作，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吳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據《廣西通志·人口志》指出，「1959-1961年由於受三年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的影響，每年的死亡人數驟增，三年總共死亡人數145.10萬人，平均每年死亡48.36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22.15‰，是建國後廣西人口死亡率最高的一個時期」^⑥。本文以11.84‰為平均正常死亡率，進一步估算1959至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67.56萬^⑦。這個數字不僅遠超過1961年自治區黨委的報告數字(30萬)，亦超過文革時期小報披露的數字(50萬)。

至於百色地區饑荒災情造成的惡果，則可見1999年官方公布的數據：1959至1961年，百色地區十二個縣連續三年總人口遞減，三年的死亡人數共76,200人^⑧，死亡率分別為：23.22‰，27.15‰，27.22‰，遠超於11.84‰的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如果將時間段拉長到中國鄉村社會變化較大的1953至1966年進行考察，便可見百色地區人口相關數據的變化與當時各種運動的發展關係密切，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大躍進、大饑荒伴隨着反瞞產運動發生，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直至1962年才恢復過來(表2)。

表2 百色地區1953至1966年人口資料表

年份	年底人口數 (萬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	重要事件
1953	176.53	46.16	23.56	22.60	統購統銷開始
1954	179.71	36.81	18.89	17.92	
1955	182.17	30.48	16.74	13.74	合作化高潮
1956	183.54	32.57	15.35	17.22	
1957	188.50	34.71	15.38	19.33	11月：大躍進開始
1958	191.40	29.60	18.26	11.34	8月：人民公社建立； 年底：大饑荒起
1959	190.49	17.29	23.22	-5.93	1月：第一次反瞞產始； 2至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 3月：第一次反瞞產終； 7至8月：廬山會議； 9至10月：第二次反瞞產始
1960	187.41	17.91	27.15	-9.24	1月：第二次反瞞產終
1961	183.78	16.88	27.22	-10.34	大饑荒烈
1962	187.14	30.35	12.34	18.01	1至2月：七千人大會、 大饑荒漸息
1963	192.93	44.32	13.04	31.28	四清運動始
1964	197.71	43.31	13.53	29.78	
1965	205.27	44.60	10.96	33.64	四清運動終
1966	212.82	39.60	9.18	30.42	5月：文革興起

資料來源：廖新華主編：《崛起的壯鄉——新中國五十年(廣西卷·資料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頁156。

說明：百色行政區劃(1998年底)：百色市、田陽縣、田東縣、平果縣、德保縣、靖西縣、那坡縣、凌雲縣、樂業縣、田林縣、隆林各族自治縣、西林縣。「重要事件」為筆者整理。

以下將全國、廣西、百色地區在1959至1961年的情形進行比較(表3)。從中可見，百色地區人口死亡率除了1960年(27.15‰)稍低於廣西的死亡率(29.46‰)、但高於全國死亡率(25.43‰)外，1959與1961年的死亡率(23.22‰；27.22‰)都比同時期全國(14.59‰；14.24‰)與廣西(17.49‰；19.50‰)高出不少。這樣的差異，或許也跟百色地區地處少數民族邊疆區域，經濟發展較為落後有關。

表3 全國、廣西、百色1959至1961年人口數及自然變動情況對比表

年份	地域	年底人口數 (萬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長率 (%)
1959	全國	67,207	24.78	14.59	10.19
	廣西	2,205	24.52	17.49	7.03
	百色	190.49	17.29	23.22	-5.93
1960	全國	66,207	20.86	25.43	-4.57
	廣西	2,172	19.40	29.46	-10.06
	百色	187.41	17.91	27.15	-9.24
1961	全國	65,859	18.02	14.24	3.78
	廣西	2,159	17.73	19.50	-1.77
	百色	183.78	16.88	27.22	-10.34

資料來源：全國與廣西1959至1961年人口數及自然變動情況，參見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歷史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頁2、642；百色地區數字參見《崛起的壯鄉》，頁156。

說明：表格中一些數據的重新核算，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反瞞產運動結束後，百色地區某些惡性事件在一定範圍內得到處理。如平果縣在大躍進期間，颳「共產風」，搞反瞞產、高徵購；1959年購糧1,519萬公斤，為1956年的1.8倍，佔當年糧食總產30.80%；強購了農民的口糧，致使1960年出現因缺糧而餓死人事件。1960年5月16日，公安機關逮捕了發生餓死人事件的坡造公社黨委書記陳海文、古平公社黨委書記袁世國，以及一些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顯然，這只是在小範圍針對部分公社與大隊幹部採取的懲處措施，負更大責任的縣、地區（及更高級別）的運動實際操作者卻置身事外，更大範圍的災難也得不到遏止，以致1961年平果縣「五病」患者仍達到27,000多人⁷⁹。

前述鳳山縣大量餓死人事件經由聯合調查組調查後，縣委第一書記張耀山等人所受到的處罰也僅是「黨內嚴重警告」⁸⁰。值得注意的是，鳳山縣的饑荒災情並非完全無糧，而是有糧卻封倉不濟民。直到1960年2月，百色地委書記處書記、行署專員趙世同到鳳山縣進行調查，才在大量餓死人的喬音公社開糧倉救濟饑民，繼而在該公社巴甲大隊召開現場會。嗣後，各公社糧所、糧站陸續開倉，發放糧食，饑荒得到緩解⁸¹。可見地方當局確實曾有限度地採取某些措施進行糾錯，以期遏制不斷惡化的局面。然而這種糾錯只是局部的，沒有持續性及普遍性，因此成效有限，鳳山縣的饑荒災情仍無法遏止。該年全縣死亡3,958人（多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由1959年的33.10%攀升為45%，人口繼1959年之後再次出現負增長⁸²。

1960年初那坡縣發生「德隆核產事件」，大約在半年後，於7月17日由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委、那坡縣委聯合組成調查組，對事件進行調查並處理，但也只是拋出幾個替罪羊：「將造成人命死亡的原核產工作隊3名人員，逮捕法辦，判刑勞改。」⁸³《那坡縣志》對該縣反瞞產運動的後果語焉不詳，但從其中所列該縣「1957至1961年度糧食總產、徵購、口糧對比表」可看出大略情形（表4）：

表4 那坡縣 1957 至 1961 年度糧食總產、徵購、口糧對比表

年度	產量(萬公斤)		徵購(萬公斤)			口糧(萬公斤)		人均口糧(公斤)	
	混合糧	比 1957年 +、-%	貿易糧	佔 總產%	比 1957年 +、-%	混合糧	佔 總產%	混合糧	比 1957年 +、-%
1957	3,282	100	431.5	13.1	100	2,590	78.9	236.5	100
1958	3,074	-6.3	836.5	27.2	+93.9	1,962.5	63.8	179	-24.3
1959	2,828	-13.8	929	32.9	+115.3	1,610	56.9	147	-37.8
1960	2,315	-29.5	572.5	24.7	+32.7	1,438	62.1	142.5	-39.7
1961	1,924	-41.4	386.5	20.1	-10.4	1,244.5	64.7	126.3	-46.6

資料來源：那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那坡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289。
說明：表格中三處百分比數值的修正，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跟 1957 年比較，1958 年是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急速推進的一年，那坡縣糧食產量仍下降了 6.3%，1958 年秋收後，徵購額陡增 93.9%，致使農民人均口糧下降了 24.3%。反瞞產運動持續進行的 1959 與 1960 年，糧食產量分別下降了 13.8% 與 29.5%，徵購數額卻分別激增了 115.3% 與 32.7%，人均口糧則分別減少了 37.8% 與 39.7%。經過兩次反瞞產運動的摧殘，1961 年糧食產量大減 41.4%，雖然徵購減少了 10.4%，但農民人均口糧仍然大減了 46.6%。

顯而易見，大躍進「浮誇風」所虛構的「大豐收」（實際大減產）導致糧食高額徵購，徵購不足即引發反瞞產運動；反瞞產運動強化了超額徵購，從而導致農民的生存處境惡化，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糧食產量也因此大幅下降；政府的徵購任務無法完成，不得不持續加強反瞞產運動的力度，以達到超額徵購的目的，由此形成惡性循環，農民的處境無疑也日益惡劣，最終導致全面性的大饑荒降臨。

五 餘論

如果說「參與式」的反瞞產運動是較柔性的操作，那麼「命令式」就是較剛性的操作，二者的形式有異但實質都是與民爭糧，到頭來，運動的實際操作者與被運動者都是輸家。在兩次反瞞產運動的摧殘下，廣西百色地區農村哀鴻遍野，農業元氣大傷，幹部群眾關係惡化，社會風氣敗壞，尤其是政府與群眾之間的互信消解，民心喪失，當時報刊所載群眾自我批判的言辭便有所透露：「漸漸疏離了黨，對黨只說三分話，沒有全拋一片心」^④；「總不相信黨，怕國家徵購、怕糧食調動」^⑤；「（糧食）埋伏起來留點後路，不相信黨的糧食政策」^⑥；「思想還是不通，不相信黨的政策」^⑦。民心的離異，還造成自集體化運動與統購統銷實施以來民間時有所見的暴烈反抗。

從文革後出版的志書可知，1958 年 9 月，廣西已出現地方性的反瞞產運動，西林縣發生瑤族農民抗拒煉鋼、攜帶火槍上山逃避的事件，被當局視為暴亂，百色軍分區派兵圍剿，打死瑤族農民十六人，副縣長李林（瑤族）被懷

疑為事件煽動者受到審查^⑥。在廣西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已發動但百色地區反瞞產運動尚未全面展開之際，12月14日百色縣泮水區百維鄉爆發「以盧永海為首的反革命暴亂」，兩日後，「縣中隊和民兵共23人前去平息，擊斃盧永海，逮捕同案犯10人歸案」^⑦。百色地區第二次反瞞產運動後期，那坡縣「德隆核產事件」後不久，便相繼發生了該縣坡荷公社「黃興鴻反革命集團」案與城廂公社「反動標語」案，後者還導致了該公社那坡大隊黨支部書記鮑漢營冤案（文革後才獲平反）^⑧。這些案件的內情雖然無法一一全面了解，但跟當時的集體化運動以及反瞞產運動應該有所聯繫，反映了群眾對當時運動與政策的不滿情緒乃至抗爭意志。

除了這類體制外的抗爭，到文革期間，亦可見體制內的「民心反擊」——利用政治運動對「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展開的批判鬥爭。1967年初，鳳山縣以老紅軍、退休幹部為主體的「革老鏟修戰鬥隊」與以下放幹部為主體的「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大力揭發批判原鳳山縣委第一書記謝應昌、張耀山等人在反瞞產運動中推行極左路線，搞「浮誇風」，造成餓死人的嚴重錯誤。此舉影響甚大，以致這兩個組織日後一度發展成為該縣最大的群眾組織^⑨。而廣西文革對立衝突的兩大派（「廣西422革命行動指揮部」與「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都指責對方所支持的自治區主要領導人（第一書記韋國清與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為廣西反瞞產運動的元兇^⑩。儘管雙方的指責都帶有強烈的派性情緒而與事實有所出入，但在對反瞞產運動的嚴厲批判上，卻表現得相當一致。

廣西百色地區的兩次反瞞產運動，從1959年1月中旬起到1960年1月底前後歷時兩年多。之前，儼然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一派熱火朝天的歡樂氣象；之後，已然是滿目瘡痍、餓殍遍野的衰敗慘景。在兩次反瞞產運動之間的1959年3月下旬至9月，當局本來有糾正錯誤、扭轉危局的良好機會：一是經歷了第一次反瞞產運動的摧殘、劫難，廣大農民與基層幹部多有不滿、乃至產生反抗的情緒與表現，甚至中高層官員亦都有所警醒、覺悟，第一次反瞞產運動在高潮之際戛然而止便多少可以反映此情形；二是從全國範圍及中共高層的形勢看，在多個高層會議，尤其是第二次鄭州會議後，毛澤東都顯示出意圖扭轉極左路線的努力^⑪，然而，隨着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反右傾運動陡然而起，政治形勢大為逆轉，極左路線變本加厲，「浮誇風」愈颺愈盛。第二次反瞞產運動以更強勢甚至不乏血腥的方式，再度蹂躪百色鄉村大地。於是，糧荒災情全面蔓延，成千上萬的農民饑饉而死，狂熱的大躍進徹底淪為慘烈的大饑荒。

註釋

① 百色與下文提及的南寧、河池、梧州等地在1971年均由「專區」改稱「地區」。為行文方便，本文統稱地區。

② 睦邊（那坡）縣，原名鎮邊縣，1953至1965年改名為睦邊縣，當時報刊都稱「睦邊縣」，1965年改名為那坡縣，文化大革命後的志書稱「那坡縣」。為了與當今稱謂一致，除了引述外，後文均稱為「那坡縣」。

- ③ 例如，1961年，西林縣從隆林各族自治縣分出恢復建制；1951年合併的凌樂縣於1962年復原為凌雲、樂業二縣；鳳山縣、東蘭縣、巴馬瑤族自治縣則於1965年劃歸河池地區。
- ④ 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4月號，頁68-84。
- ⑤ 參見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2期，頁54-64；夏林：〈「大躍進」後期江蘇農村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頁103-108；劉瑜：〈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中國革命中政治參與的政治心理分析〉，《學海》，2010年第5期，頁34-47；蔡天新：〈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烹調增量法」的歷史反思〉，《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頁1-6。
- ⑥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Russia: A Comparison"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111-32, 179-200.
- ⑦ 參見何翔：〈大躍進時期，高鶴縣的「反瞞產」運動〉，《源流》，2011年第3期，頁30-31；張再興：〈「貴州事件」始末〉，《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頁26-30；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頁677-98；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129-225。
- ⑧ 毛澤東：〈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1959年2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52。有關廣東瞞產私分的背景，參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魏海生等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北京：求實出版社，1990），頁159-65。
- ⑨ 楊繼繩：《墓碑》，上冊，頁400。
- ⑩ 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頁62。
- ⑪ 參見貴港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港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30；賀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賀州市志》，上卷（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38；柳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柳江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18。
- ⑫ 〈丟掉本位主義思想，插上共產主義紅旗——我區普遍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核實產量，保證豐收〉，《廣西日報》，1958年11月7日，第1版。
- ⑬ 耿慧君等：〈梧州南寧區開展核產報豐收運動〉，《廣西日報》，1958年11月15日，第2版。
- ⑭ 〈地委召開會議指示各地，結合整社抓好糧食工作，並強調要突出挖紅薯和護牛過冬〉，《右江日報》，1959年1月12日，第1版。
- ⑮ 〈健全機構，搞好經營管理，建立與健全管理制度〉，《右江日報》，1959年1月22日，第1版。
- ⑯⑰⑱ 區黨委農村政治部等：〈誰是廣西反瞞產的罪魁禍首？——廣西反瞞產事件調查〉（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平樂縣聯合總部翻印，1967年6月30日）。
- ⑲ 崔明德、梁大科：〈報出糧食光榮，人人自報爭先，田東各公社已報出三百多萬斤埋伏糧〉，《右江日報》，1959年1月31日，第1版；中共睦邊縣委通訊組：〈對症下藥，藥到回春，睦邊報糧工作迅速開展〉，《右江日報》，1959年2月1日，第1版。
- ⑳㉑ 〈地委召開各縣委電話會議，對當前糧食工作作了幾點重要指示，並指出在搞好糧食工作的同時，切實抓好當前生產〉，《右江日報》，1959年1月31日，第1版。
- ㉒ 陸業琚、黃鳳冠：〈反覆講明政策，大宣傳大表揚，凌樂各公社交出糧食二百多萬斤〉，《右江日報》，1959年2月5日，第2版；劉華定：〈隆林報糧工作蓬勃開展〉，《右江日報》，1959年2月6日，第1版。
- ㉓ 〈地委召開電話會議，對當前糧食和生產作了重要指示〉，《右江日報》，1959年2月22日，第1版。
- ㉔ 〈通過「五查」批判右傾鬆勁思想，龍臨公社摸清糧底決心徹底搞好糧食工作〉，《右江日報》，1959年2月25日，第3版。
- ㉕ 毛澤東：〈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頁52。

⑳⑳㉑ 〈地委召開糧食工作電話會，楊書記作重要指示，糧食這一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公社幹部們、社員們趕快向黨交心報出埋伏糧〉，《右江日報》，1959年2月27日，第1版。

㉒ 陸英材、吳聲濤：〈貫徹地委指示，再次掀起報糧高潮，德保報出埋伏糧一億多斤〉，《右江日報》，1959年3月12日，第1版。

㉓ 參見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五）〉（1959年3月5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二）〉（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四）〉（1959年3月1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內部發行，出版資料不詳），頁215、204、205、214。毛澤東這一次講話全文，在中國大陸官方出版的有關毛澤東著作（如《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均無刊載，所選載者則缺少頗多有關毛支持瞞產私分的內容。箇中緣由，耐人尋味。

㉔⑳ 〈大事記〉，載田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23。

㉕ 在此前，《右江日報》還多次結合反瞞產運動的表現，報導該次會議的消息。參見〈田東縣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徹底搞好糧食工作，爭取思想、糧食、生產三大豐收〉（1959年3月3日，第1版）；〈田東報出二千五百二十多萬斤，其中主糧九百四十多萬斤，雜糧一千五百多萬斤，並報出油料一十七萬多斤〉（3月7日，第2版）；〈邊報糧交糧邊安排食堂生活，聯雄大隊幹部、代表心情舒暢決心搞好糧食工作〉（3月13日，第2版）。饒有意味的是，3月13日的報導，也無記載地委書記在3月10日做重要報告的消息。

㉖ 廬山會議及之後的反右傾運動，對中國當代史影響重大且深遠，研究論著亦十分豐富，本文不再贅言。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台北：新銳出版社，1993）；劉慶旻：〈廬山會議後期反右傾悲劇的緣由〉，《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1期，頁50-54；姬曉輝、張豔華：〈近二十年來廬山會議研究述評〉，《北京黨史》，1999年第4期，頁34-38。

㉗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頁55。

㉘ 田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田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17、548-50。

㉙ 右江日報通訊組：〈深入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百色專區開展關於葉卜合思想轉變的討論〉，《廣西日報》，1959年11月5日，第1版。

㉚ 〈絞死土皇帝，槍斃韋國清〉、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絞死韋國清！為死難的廣西五十多萬階級兄弟報仇雪恨——揭發韋國清反瞞產的滔天罪行〉，《南疆烈火》（廣西紅衛兵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南寧八三一部隊指揮部），聯5號（1967年6月8日），第1至4版。這些事件揭露反瞞產運動期間，當地農村基層幹部與農民受到殘酷迫害，以致家破人亡，有不少人不得不逃亡到越南。當時報刊對此均無報導，除「環江事件」外，其他事件在文革後的志書亦無載錄。關於「環江事件」，參見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337-41。

㉛⑳⑳ 有關「德隆核產事件」，參見那坡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那坡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403-404；409；409-10。

㉜ 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絞死韋國清！為死難的廣西五十多萬階級兄弟報仇雪恨〉，第3、4版。

㉝⑳ 靖西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靖西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425。

㉞ 丁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頁228。廣西及百色地區的大饑荒情形見本文第四節詳述。

㉟ 「小球藻」是一種生長快、產量高，可當家畜和家禽精料的單細胞藻類植物，但當時卻被認為有高營養價值，可作為代食品推廣給老百姓果腹充飢。所謂「雙蒸飯」，即將飯蒸好後，揭蓋灑上水又蒸一次，效果是飯的質感鬆軟，不需咀嚼，感覺上要比「單蒸飯」飽肚子，被譽為「先進煮飯法」。「轉移鬥爭大方向」為文革用語，意指出於政治

考量(意圖), 著意將鬥爭(運動)的矛頭(方向)轉移到其他方面; 在此用來形容文革前的情形, 也頗為貼切。

⑳ 〈為高速發展養豬業提供飼料, 溫州專區大量繁殖小球藻〉、〈怎樣繁殖小球藻〉, 《右江日報》, 1960年1月22日, 第2版; 「掀起群眾性的大搞小球藻運動」為通欄標題, 《右江日報》, 1960年3月16日, 第2版。

㉑ 如《廣西日報》、《廣西青年報》(南寧)、《南寧日報》(南寧)、《桂林日報》(桂林)、《桂林前進報》(桂林)、《躍進日報》(柳州)、《梧州躍進報》(梧州)、《大眾報》(玉林)。

㉒ 凌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凌雲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7), 頁34-35。

㉓ 以上均參見黃日就、黃漢綠、藍有金:〈要中央決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鳳凰公社組織宣傳隊深入邊遠大隊宣傳訪問, 掀起鳴放整改高潮〉, 《右江日報》, 1959年1月25日, 第1版。

㉔ 陸生理:〈苗族社員熊卜周, 愉快交出代管糧〉, 《右江日報》, 1959年2月11日, 第2版; 羅啟春、廖廷振:〈安排好社員生活, 反覆交代政策, 平果城關公社報出二百多萬斤代管糧〉, 《右江日報》, 1959年2月13日, 第1版; 覃錦仕:〈重重顧慮永拋棄, 一心依靠共產黨, 瑤族社員鄧卜章交出一萬六千多斤代管糧〉, 《右江日報》, 1959年2月24日, 第3版; 多敬中學:〈多敬中學報出代藏糧一百多萬斤〉, 《右江日報》, 1959年2月6日, 第1版。

㉕ 〈清理代管糧食, 辦好食堂過好年, 巴馬公社反覆交代政策消除顧慮, 自報糧食逐步深入〉, 《右江日報》, 1959年2月3日, 第1版。

㉖ 〈回憶對比算賬, 人人向黨交心, 巴馬四級幹部會開展階級教育〉,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8日, 第1版。

㉗ 〈向黨靠攏, 向黨交心, 德保縣四級幹部代表爭先報糧〉,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8日, 第1版。

㉘ 劉華定、伍如棒、蘇振宗:〈領導深入, 突破重點, 帶動全面, 隆林一天報糧七千多萬斤〉,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11日, 第1版。

㉙ 〈隆林各族幹部堅決聽黨的話向黨交心, 一個小時報出埋伏糧一百七十多萬斤〉,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9日, 第1版。

㉚㉛ 〈向黨交心, 糧油並舉, 凌樂四級幹部會議掀起報糧高潮, 四個小時內報出埋伏糧二千九百多萬斤, 油料八萬多斤〉,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12日, 第1版。

㉜ 如這時期《紅旗日報》只有一例:黃汝榮:〈向黨交心, 與黨同心, 報出糧食, 鞏固人民公社〉, 1959年2月1日, 第2版。《梧州躍進報》只有二例:〈堅決向黨交心交糧〉, 1959年3月8日, 第1版; 黃大能:〈我堅決向黨交了心〉, 1959年3月14日, 第1版。

㉝ 〈老根據地幹部群眾永遠和黨一條心, 巴馬1天報糧1,600萬斤〉,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11日, 第1版。

㉞ 黃漢昌:〈堅決和資本主義分家, 百色四級幹部代表決心開好大會〉,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4日, 第1版。

㉟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三)〉(1959年2月28日), 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 頁208。

㊱ 〈靖西四級幹部會展開兩條道路的辯論, 一直肯定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 鐵的事實駁得「算賬派」啞口無言〉,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4日, 第1版; 〈肯定大豐收, 駁倒算賬派, 鳳山已報糧一億二千多萬斤〉,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12日, 第1版; 〈回憶對比算賬提高覺悟, 德保四級幹部會狠狠批判各種錯誤思想〉, 《右江日報》, 1959年3月5日, 第1版。

㊲㊳ 百色市志編纂委員會編:《百色市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3), 頁394; 16。

㊴㊵㊶ 鳳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鳳山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9), 頁117-18; 17; 17; 382。

㊷ 此即所謂「捨農村保城市」的部署。參見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110, no. 460 (2000): 136-58;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3, no. 3 (1984): 339-77.

㊸ 〈在農村深入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 《廣西日報》, 1959年11月5日, 第1版。

- ⑥④ 〈明確指導思想，加強組織領導，依靠廣大群眾，全面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高潮，地委召開電話會指出當前幾個重要問題〉，《右江日報》，1959年11月22日，第1版。
- ⑥⑤ 毛澤東：〈《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語〉（1955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25。
- ⑥⑥ 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區工作組：〈算十筆大賬，思想亮堂堂，邏索大隊通過算賬對比，社員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以鐵的事實粉碎了「今不如昔」的謬論〉，《右江日報》，1959年12月12日，第2版。
- ⑥⑦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7。
- ⑥⑧ 〈鄭州會議記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27。
- ⑥⑨ 顧準：《顧準文存·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169、227。
- ⑦⑩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377.
- ⑦⑪ 德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德保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351。
- ⑦⑫ 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委、鳳山縣監委聯合調查組：〈對匿名來信反映鳳山縣委第一書記張耀山同志在糧食核產中官僚主義致使全縣餓死幾千人等問題的調查報告〉（1961年5月17日），載《鳳山縣志》，頁806；百色地委、鳳山縣委聯合調查組：〈關於鳳山縣寨牙公社在糧食核產期間發生非正常死亡情況的檢查報告〉（1961年7月4日），載《鳳山縣志》，頁809-12。
- ⑦⑬ 參見韋純束等主編：《當代中國的廣西》，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105-106。
- ⑦⑭ 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給毛主席的一封信〉，《南疆烈火》，聯5號（1967年6月8日），第2版。另參見區黨委農村政治部等：〈誰是廣西反瞞產的罪魁禍首？〉。
- ⑦⑮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61。
- ⑦⑯ 本文採用之「平均正常死亡率」，參見李閩榕、萬克峰：〈「三年自然災害」真的餓死3,000多萬人嗎？——對茅于軾先生《饑荒餓死人估算方法》的驗證〉，《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2期，頁83-89。該文經聚類分析，判定1955和1956為正常年份，基於這兩年的全國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設定平均正常死亡率為11.84%。此處相關數據的統計，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李同學所貢獻，特此致謝。
- ⑦⑰ 參見廖新華主編：《崛起的壯鄉——新中國五十年（廣西卷·資料篇）》（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頁156。
- ⑦⑱ 平果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平果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23。
- ⑦⑲ 自治區黨委、百色地委、鳳山縣監委聯合調查組：〈對匿名來信反映鳳山縣委第一書記張耀山同志在糧食核產中官僚主義致使全縣餓死幾千人等問題的調查報告〉，頁808。
- ⑦⑳ 帥天貴：〈有誰比黨親，我向黨交心〉，《右江日報》，1959年3月12日，第1版。
- ⑧① 〈邊報糧交糧邊安排食堂生活，聯雄大隊幹部、代表心情舒暢決心搞好糧食工作〉，第2版。
- ⑧② 覃錦仕：〈重重顧慮永拋棄，一心依靠共產黨，瑤族社員鄧卜章交出一萬六千多斤代管糧〉，第3版。
- ⑧③ 西林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西林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頁19。
- ⑧④ 〈絞死土皇帝，槍斃韋國清〉，第1、2版；區總工會《五一》兵團、《東方紅》兵團整理：〈伍晉南的罪惡靈魂〉，《818戰報》（廣西南寧市818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1967年5月16日，第2版。
- ⑧⑤ 張素華：〈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思想歷程——讀這一時段的《毛澤東年譜》〉，《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頁17-21；吳鳴、熊琛：〈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糾「左」述評〉，《黨史文苑》，2015年第16期，頁67-69。